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 学术通讯

清園

No. **1** 2017

第四十一期



2017年3月15日至17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东亚人文研究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来自三所大学的33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交论文并作会议报告。香港城市大学李孝悌教授、程美宝教授、陈学然副教授、赵颖之副教授，京都大学的木津祐子教授、杉浦和子教授，复旦大学的邓菲副研究员、张佳副研究员全程与会并作学术指导。会议期间，与会同学还参观了香港海事博物馆和屏山文物径。



2017年2月23日，葛兆光教授应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邀请，在首尔作题为《在场者与不在场者——从朝鲜通信使文献看东亚三国》的演讲，西江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教授尹炳男、国民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池斗焕、建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承贤担任评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朴仁国（Park In-Kook）总长主持。

# 目 录

第五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亚人文研讨会纪要 .....	2
访学纪要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后记 .....	10
巴黎访学记 .....	12
新书介绍 .....	14
外刊撷英 .....	17
第七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招生启事 .....	21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7.01—2017.03) .....	23

# 第五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东亚人文研究研讨会纪要

林 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7年3月15日至17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东亚人文研究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来自三所大学的33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交论文并作会议报告。香港城市大学的李孝悌教授、程美宝教授、陈学然副教授、赵颖之副教授,京都大学的木津祐子教授、杉浦和子教授,复旦大学的邓菲副研究员、张佳副研究员全程与会并作学术指导。

3月15日上午9点,研讨会正式开始。京都大学的木津祐子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张佳副研究员分别代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科长平田昌司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宣读书面致辞。两位学者都强调了三方合作对促进学生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并指出新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推进亚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三校论坛的目的所在。香港城市大学首次以东道主身份组织会议,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



李孝悌教授代表校方致辞,欢迎三校师生齐聚城大参与研讨;强调跨专业、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及青年人之间互相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意义;祝愿会议圆满成功,大家在香港生活愉快。

首日举行了5场专题研讨,分别以“古代文学与文化”、“现代文学”、“人文地理”、“区域文化研究”和“艺术与考古”为主题。



第一场“古代文学与文化”由来自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祝世洁担任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周金泰报告了《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中存在数量可观的相人故事，这些故事中的相人术不仅是一种用来预测命运的法术知识，更是一种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功利”知识。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这些相人故事真实与否，但它们在特定政治事件中所承担的功能却是可以被把握的。本文选取《史记》所载汉初女相师许负的相人故事为个案，详考许负故事的背景与原委，并着重讨论了其与文景政局书写的关系。文章指出，许负故事产生于文景朝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并参与了文景之治的建构过程，藉由许负故事，文景政局中某些历史细节或可更为清晰地被呈现。同时，司马迁选择将许负故事收入《史记》，也是其叙事策略的需要。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伊藤令子报告了《从六朝到唐代的异界描写的变化——以海上的异界为中心》，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献中就有对诸如“蓬莱山”这样的海上神秘岛屿的记述。尽管存在这种记述，但在六朝志怪文献里面却没有人到达海上神秘岛屿的故事。唐代以后则出现了《元藏记》等记述人到达神秘岛屿的故事，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两者的记述目的不同：六朝志怪是个人实际经验怪异事件的“记录”，唐代传奇是作者创作的“虚构”故事。从“记录”到“虚构”的变化一方面可以让人在故事里面到达神秘的岛屿，另一方面又让

这样的岛屿变成了“虚幻”的存在。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韦祎，对活跃于宋元易代之际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刘辰翁的诗歌评点中的尚「奇」意识做了分析，通过对「意」、「事」、「辞采」、「风格」四个要素解构、梳理刘辰翁诗歌评点中所崇尚的「奇」之内涵，指出其文学观念中存在的辩证思维，并试图探究其诗歌评点中尚「奇」意识的形成因素。复旦大学中文系翟墨作了题为《经过选择的杜甫记忆：以明人眼中的元代“谥杜”为中心》的报告。元代后期，在一位蒙古人的提请、汉族文人群体的支持下，朝廷追谥杜甫为“文贞”，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以来，人们对“谥杜”的记忆日趋淡漠，请谥人的姓名、身份、民族属性等关键信息多有讹误乃至缺失；与之并行的，是有明一代对“蒙元符号”的诸多避忌。翟墨的报告即从此一背景出发来探讨杜甫谥号在明代的失落，进而试图对明代文学的思想背景提出自己的思考。

第二场“现代文学”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张乐锋担任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邹经报告了《这赞美诗对艺术而言却可能是墓志铭——由萧红的三篇佚文说起》。报告从萧红的三篇佚文入手，提出什么是日记的问题。首先，借用鲁迅先生的分类，拓宽对日记的理解；其次，通过分析日记的研究价值，看到它的局限性；最后，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以见出记忆演化为艺术之后的力量。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赵侦宇在报告《公安三袁、周作人关系论再探》时认为，将晚明文学引介到近现代文学的周作人，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介绍了以公安、竟陵派为主的新文学运动，但后续引起的论争焦点却集中在「公安三袁」身上，加上该书影响力太大，导致当提及周作人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世人多忽略了「公安三袁」以外的晚明人物。赵侦宇先从「公安三袁—周作人」的连结是如何在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论争下形成的谈起，点出该连结乃是出自于外部论争，而非周作人本身；再引周作人的文章，以证明对于周作人而言，晚明的影响来自于一连串的名单，公安



三袁不过是众多名字当中的一例。试图藉此强调仅从三袁去谈晚明对周作人的影响是过于狭隘的,并认为相关研究应做全面、比较性的观照。京都大学的祝世洁报告了《创造社的“创造”——试对发刊诗〈创造者〉做一解读》。在探索创造社的社名由来的基础上,以《创造》季刊的发刊诗《创造者》为线索,初步探讨“创造”这一关键词的哲学背景,以此一窥早期的创造社以“创造”代替“革命”这一时代精神的雄心,为重新审视早期创造社文学在新文学革命中的定位提出一点想法。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陈莹,以我国最早的一本综合性摄影画报——民国时期《良友》画报(1926—1941)为研究对象,从画报刊登的儿童用品广告入手,反思摄影术的纪实性。在画报刊登的儿童用品广告中,韦廉士公司的儿童药品广告,利用摄影术“构成现实”的特性,使产品具有不可置疑的公信力;然而,事实证明,摄影术毋庸置疑的写实特性恰恰给广告骗术以可乘之机,人们需要对媒介技术进行更深的反思。

第三场“人文地理”由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黄沉默主持。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社会学专修的徐尧作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意识》的报告,认为在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过程中,6亿农村居民享有重要的话语权。民意支撑着福利国家的合法性,为衔接宏观福利意识形态研究与微观福利态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徐尧基于福利体制论展开对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的探讨,并以中部内陆省份两县的农村居民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倾向于支持高度去商品化程度的福利体制,该社会福利意识和现行福利体制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对家庭主义福利体制的不支持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化,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此具有解释力。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地理学专修的熊野贵文报告的是《日本大城市郊外住宅储备的地区性不均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的大都市圈经历了人口郊区化,90年代前期泡沫经济崩溃后,城市中心区人口恢复增加的同时,在都市圈郊区,居民

的高龄化以及闲置房问题开始显现。另外,战后的经济主义住宅政策导致了住宅的建设过剩问题——这是一种住宅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闲置房的增加以及以新建住宅为中心的市场结构,导致了闲置房大量存在的同时仍在进行新住宅开发的住宅储备不均衡。熊野的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三大都市圈中,在地区性的细分住宅市场,特别是平均空房率较高的住宅市场,是否存在新建住宅开发导致的住宅储备地理性不均衡问题。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地理学专修的谷本凉以大阪都市圈北部为例,考察城市郊区病床可得性的变化。发现从2010年到2015年,病床的满足状况总体上是恶化的,这一现象在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许多卫星城格外显著。此外,政策性的患者人数减少,也可能会导致肩负长期护理任务的护理机构容量不足等其他问题。人们身边已经存在各种各样保障必要医疗设施的医疗规划和城市规划,为实现重视个人对各种设施及服务可得性的简约型城市规划、缩小服务水准的地区差距、保障与宏观政策性目标的协调性,与地理层面相关人员的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今天的医疗语境中,一项具有宏观且具体目标的医疗保健政策是必须的。



第四场“区域文化研究”由京都大学的徐尧主持。复旦大学的张乐峰报告的题目是《工业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闵行镇的归属纷争》。张乐峰指出,明代中后期,闵行镇凭借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与棉花种植业的繁



荣,成为上海县重要的商业市镇。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闵行区与上海城区间经济联系日渐密切,政治地位也日趋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政策与华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得民国时期奠定重工业基础的闵行区备受各方重视。在国家政策、经济体制、地方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闵行区由江苏省上海县划归上海市,反映了上海市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过程。复旦大学旅游学系的张秦则以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例,报告了自己对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区域文化旅游主题构建的研究心得。她认为,文化认同在旅游体验中发挥着凝聚力、向心力的精神引导作用。福建省海上丝路历史悠久,海丝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极具文化旅游开发价值。报告从文化认同与旅游主题关系出发,试图在海丝文化区域内构建起科学、合理文化旅游主题,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文化旅丝文化与旅游主题创建间逐步深化式耦合发展。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地理学专修的朝仓慎人也以位于日本四国山地山间的德岛县东祖谷地区的落合集落为例,报告了自己对人口过少村落旅游振兴的现状问题的研究。朝仓以当地居民为对象,进行了关于落合集落旅游振兴的意向调查。首先,在落合集落,很多居民对旅游振兴并不关心,但很多人对于修缮老朽古民居表示欢迎;其次,即使是当地领导,也认为旅游振兴是因受三好市委托而提供协助,并没有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思。显然,在落合集落,当地居民缺乏对旅游振兴的自发性。在着眼于人口过少化问题时,居民的自主性的缺乏可能会导致旅游振兴政策收效甚微。

担任第五场“艺术与考古”的主持人是香港城市大学的陈莹。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李铀报告的是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的研究。画中所绘为苏州西部天池山的实景,有别于以往学界对元代实景山水主要为隐居书斋和纪游图的认识。李铀通过考察此画主题、内容及受画人,试图揭示此画景观和风格层面上的道教意涵,从而探讨元末文人画家对地方实景的形塑的特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

院的庄程恒报告的是对北宋孙四娘子墓的研究。江苏江阴夏岗城西出土的“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是研究北宋前期士大夫阶层丧葬观念的重要案例。庄程恒试图从该墓随葬佛道经卷的现象,探究北宋前期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对于终极关怀上和现实利益的多重诉求;并结合出土明器的十二生肖俑和微缩的桌椅,进一步指出,作为江北移民家族墓葬,葬俗具有南北地域差异和礼仪传统的交织重迭的特性,从而显示北宋前期士大夫阶层在唐宋之际丧葬礼俗变迁背景下的多元面相。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罗秀芝则以安丙墓为例探究性别空间的塑造问题,她指出宋代川渝贵地区的合葬墓非常流行。石室合葬墓的墓室内部构建特点表现在:1、男女墓主墓室的分置;2、男女墓主墓室的装饰。建造者有意识地对男女墓室进行有区别的装饰,以体现男女墓室的性别差异。比如,墓主人浮雕坐像(此处的墓主人浮雕除了辨明墓主性别外,主要还是“灵座”的概念)以及以墓主为中心的后龛图案的设置,墓室两侧装饰题材的运用(文官、乐伎浮雕,启门图前的人物,花卉图案的使用等)。该地区石室墓中合葬墓的建造有着强烈的自身特点,企图设置不同的性别空间以供墓主使用。

3月16日的最后四场报告以“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人物研究”、“东亚历史与文化交流”、“文字、训诂学”为主题。



第六场“古代历史与思想”由香港城市大学的余文翰主持。城大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林皓贤做了《西夏



军补给系统与战争的关系》的报告,指出西夏王国在立国之前及元昊时期,从现存史料中并没有太多关于后勤补给体制的记载,直到仁孝时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才有较为完整有关补给的条例。以往研究西夏历史的学者,均认为西夏军主要是以游击为主的机动部队,「擒生军」的设立,反映其以战养战,通过敌军资源来补给的特征。此种说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亦可说道出了西夏军前期的作战特点;但林皓贤认为,西夏王国在不断通过战争建立国家的漫长过程中,不可能由始至终只利用「擒生军」为其补给系统。随着国家形式的建立以及体制的完善,国防系统亦会相应得到完善发展。这一点,其实已反映于《贞观玉镜将》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之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韩艺丹的报告题为《元明之际名僧璧峰宝金“神化”考》。元末明初高僧璧峰宝金(1308—1372)是小说《西洋记》主人公金碧峰的原型,其事迹学界已有所考辨,但仍存诸多待发之覆。韩艺丹认为《明史》中所载明初“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之人,系指璧峰宝金,但与史实不符。璧峰宝金在明代被不断附会和神化,其形象最终演变为《西洋记》中的碧峰长老。璧峰宝金被神化的原因,当是由于其禅密兼修,擅长密教施食仪轨与法术。他也因此深受明太祖信赖,不仅被误传为僧官衙门的始作俑者,且很有可能与后世的瑜伽僧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杨洁则以新见《元邠州淳化县重修华岳庙并创建乐楼题名记》碑为中心,报告了她对元代关中“华岳”信仰与“祈雨”习俗的考察。认为元代关中以儒士为主的地方知识群体引导并规范着普通民众的信仰活动与文化认知,其行为对地域文化的发育产生影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周磊的报告,则在分析告子思想的基础上,初步梳理明儒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1474—1544)对「生之谓性」理论的继承与扬弃。认为王廷相继承了告子的「以生言性」,并将告子的「性无善无恶」发展为「性有善有恶」。王氏定义「气」对「性」具有笼罩性的影响,同时又提出「变质成性」的思想。其特点有三:一是对学习「圣人之道」与「诵诗读书」做了区分。前者有助于「变化气质」以

养成「善性」,并且人人皆禀赋此种能力;后者则对于改变人性没有直接效用,而且「诵诗读书」能否「施于治」还受到个人天赋等制约。二是强调「上智之人」、「中人」以及「下愚之人」均需要不断地学习圣人之道才能培养「善性」,从而将人性彻底动态化。三是人心完全具备学习「圣人之教」的天赋,从而为「变质成性」提供了可能。结论是,王廷相削减了有生之初性善性恶对整个人性的影响,转而突出了后天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第七场“文化人物研究”由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专修的廖明飞主持。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曾汉棠的报告题为《小论简朝亮(1852—1933)的朱元璋(1328—1398)观》,指出简朝亮重视“五学”,其中的“经学”和“史学”是互相贯通的。报告以简氏论明太祖朱元璋为例,借指出朱氏的出身、节俭和得位而行、有功社稷和对经术的推动,说明了出现“洪武之治”的由来和产生道理。因太祖的管治,带来贤能的附和、支持;相反,若君主不重经术,则国亡无日。同样来自城大的董显亮报告的是对晚明儒生、医学家缪希雍及其所著《神农本草经疏》的研究。他认为世人对缪希雍的评价,由明至清有一个巨大转变,从行为狂放、喜论世事的羽人剑客,转变为师心自用、牵强附会的医书经典的阐释者。这种转变反映出,晚明士人文化与医学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神农本草经疏》的刊行是一次文人活动,它的声名和士人集团同消同长。而缪希雍则一直试图平衡「儒生」与「医者」两



种身份,并试图建立一套确认自我的方式,即在注疏与经典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医者」的语言是他认识世界的基础,而「儒家」的思考方式则帮助他划定了医学的边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保罗未能来港出席会议,他的报告《中国第一位主教罗文藻》由韩艺丹代为宣读要旨。保罗通过对中西文献的梳理,发现罗文藻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位主教”,背后的驱动是法国教区神父(陆方济)试图通过培植一位中国本土主教来制约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在亚洲的力量。然而,在这场法国教区神父与西班牙修会神父的冲突中,身为多明我会修士的罗文藻非但没有选择中立,相反倒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西班牙一边,拒绝宣誓服从于提拔自己的法国代牧。在信仰与权力之间,罗文藻选择了前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林磊以史学家严耕望的成学历程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标举的新学术理念如何吸引和调动来自“敌方阵营”的读书人。通过对严耕望“出‘钱’入‘傅’”的经历的梳理,重建其与史语所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对话和辩证关系,进而指出在这对话辩证历程中隐然有一个主题:“新史学如何同时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想要同时维持两者,是像严耕望那样的五四后史家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许多著述中一再出现的主旋律。

第八场“东亚历史与文化交流”由复旦大学的周金泰主持。京都大学的廖明飞以李朝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为中心,考察了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在东亚世界的展开。他指出朱子晚年与弟子共修礼书,生前完成《仪礼经传通解》正编的修定工作,续编丧、祭二礼则由门人黄干和杨复相继完成。因未经朱子最终定稿,《通解》素被目为朱子的“未完之书”。约在清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之间,集中出现针对《通解》一书的重辑、补订之作,以江永《礼书纲目》和梁万方、梁开宗父子考订《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为代表性成果。与此同时,李朝后期的性理学者韩元震也已草定《仪礼经传通解补》。韩元震认为《通解》的不足是只载古礼,需要加入朱子“折衷损益”古礼的有关言论和著

述,始成完书。因此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以朱子的文集、语录和相关著作编入《通解》原目之下,为《通解》在李朝朱子学一尊主义思想下独特展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张志翔的报告题为《抗争与妥协:新亚书院课程理念的转变(1959—1961)》。1949年后,因中国大陆政权变动,一批南下学人来港兴办学校,这些学校被称为中文私立专上院校或中文学院(下文称私专)。1950至1960年代,香港处于冷战时期,港英政府出于自身的中立政策及管治需要,决定选取新亚、崇基、联合三所私专成立中文大学,并借机加大对私专教育尤其是课程的控制。报告围绕1959—1961年新亚书院的课程修订,揭示了香港冷战时期,港英政府藉成立中文大学为由干预新亚课程,进而探究以钱穆为代表的南来学人如何在与政府的周旋中坚持一套中国大学的理念。虽然共同必修科的主张最后难以实行,但这一课程设置及其理念却为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意义。这一课程修订的过程,一方面诠释了南来学人在港兴学的渊源与其一脉相承的课程理念,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冷战香港这一变局对中文课程设置的形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李越在全面掌握并梳理日本“全共斗”运动的历史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考察日本60年代学生运动发生的国内国际社会背景,理清日本学生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特别通过“安保斗争”和“全共斗”运动的相互影响,综合分析运动的变迁过程,探究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及对后世日本社会的影响。香港城市大学的余文翰在题为《共谋与反抗:消费时代的香港新诗》的报告中指出,往常学界惯以城市诗歌及身份焦虑处理香港新诗的发展,忽视了文本的演变;而本土学者将文本与理论结合试图揭开香港新诗的更多面貌,却难以照顾到整体视野。他则倾向于以消费时代概括上世纪70年代以降的香港,呈现时代与文学脉络两种建构的对抗与共谋。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黄诗琪的报告题为《“西方”的位置:高桥和巳与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之比较》。高桥和巳与王元化分别是日、中对《文心雕龙》进行纯粹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二者的研究



有其相似的模式,即在西方美学、认识论的启发之下对《文心雕龙》进行解释与研究。然而二者的研究态度与观点又有很大的不同。黄诗琪通过比较二者的研究,试图揭示二人在不同研究方法下隐藏的对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两对关系的看法。



第九场“文字、训诂学”由香港城市大学的董显亮主持。香港城市大学的黄湛在题为《戴震治学理念与清儒之根本分歧——兼论陈澧对戴学的继承和修正》的报告中指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是乾嘉考据学家尊崇的治学理念。戴震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解经的次第,即「故训明」、「古经明」、「理义明」三个步骤。依循这个方法,戴震最终得到与程朱理学不同的义理。然而,他的「新义理」却倍受考据学家的排抵。双方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决定了考据学家与戴震治学上的同途殊归。道咸以降,「汉宋兼采」学风渐盛,学者对乾嘉考据做出修正。在「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指导下,主张「汉宋兼采」的学者一方面继承戴震解经的路径,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挑战处于权威地位的程朱理学。当两种义理发生矛盾时,学者往往采取「调和」的策略。两种义理的矛盾,是乾嘉时期和晚清学者面临的共同「困境」。探讨这一问题,可以为乾嘉考据与义理最终的分裂脱节提供一种解释;也可以对晚清学者「调和汉宋」的可行性及实行的困难,做出考察和反思。复旦大学中文系王非凡的报告,通过对 20 世纪前



期日本人编写的字典《上海声音字汇》进行梳理和考察,重点关注字典所反映的当时上海话的语音面貌。通过与同时期及后世文献的对比,认为该字典大致反映了百年前上海话的语音系统,同时在音系处理上考虑到了字典本身所需要具备的实用性与便捷性。此外,也讨论了在历时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利用此类材料。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修的黄沉默的报告,以浙江泗溪镇的蛮讲为代表,考察了泰顺蛮讲的音系和历史音韵特征。



报告会结束后,全体师生进行了圆桌讨论,就研讨会中共鸣较多的一些学术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香港城市大学的李孝悌教授、复旦大学的张佳副研究员



和邓菲副研究员,对与会同学们的理论兴趣及实践表示了高度赞赏,但同时提醒大家要对理论保持适当的距离,恪守论从史出的底线。京都大学的木津祐子和杉浦和子教授提议,与其“理论交织”还不如“方法多元”来得更为切实。

为了让与会同学获取更为丰富的实地体验,本次研讨会还特地安排了一天的香港历史文化考察。3月17日上午,在香港城市大学赵颖之老师的带领下,与会师生来到位于中环八号码头,面朝维多利亚港而建的香港海事博物馆,通过陶瓷、船模、仪器、画轴、照片等丰富的馆藏,了解香港在南中国海沿岸航运史上扮

演的角色及其与世界各地的经贸、文化交往史。下午,又在城大陈学然、程美宝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新界元朗的屏山文物径,参观了最能反映新界传统面貌及宗族生活的「三围六村」,尤其是作为新界大宗族之一的邓氏家族的祠堂、书室、古塔、古庙等历史建筑。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程美宝教授的细致讲解,让大家了解了国际大都市香港的“现代的非现代性”。

3月18日,来自京都和上海的师生陆续离会。虽然论坛的时间并不长,但大家还是在学术研讨和日常生活中增进了了解、结下了情谊,期待在明年京都举办的第六届研讨会上再相聚。

#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后记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自从2011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之后,2014年,我在日本岩波书店又出版了日文版《中国再考——领域、民族、文化》,这本小书收在“岩波现代文库”中;同一年,这本书的中文增补版《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也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了这几本书,我以为,围绕“中国”,涉及疆域、民族、宗教、国家、认同话题的讨论,在我这里大概应该告一段落,我可以重回原来有兴趣的思想史研究领域。但没有想到,近来这个话题热度没有衰退,反而在学界越来越热闹,好些与此相关的论著不断出现,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不断提出,这使我不能不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对史料加以重新检视,对问题进行认真回答,对质疑进行深刻反省。一个特别的契机是,今年(2016)的初夏,在罗多弼教授和张隆溪教授的推动下,瑞典皇家历史、考古与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何为中国”讨论会。会前,罗多弼教授要求我率先发言,以便引起大家讨论,这逼着我不能不再写一篇有关这一

方面的论文,来回答新出现的种种问题。恰好,在种种对于“中国”、“周边”论述的质疑中,一个有关中国“内”、“外”的问题特别刺激我,有人质疑,什么是“周边”?这个问题恰恰涉及到什么是“中国”。因此,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撰写一篇论文提交会议。

可是,我没有想到,这篇论文越写越长,最后就成了这本小书,以至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会上,我只能提交一篇经过大幅删减的简本供大家讨论。

现在回想起来,说实在的,我没想到这一话题会引起那么多关注,因此也由衷感谢这几年里学界朋友的相助和指点。2011年《宅兹中国》出版以后,台北联经的《思想》杂志、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大陆的《开放时代》、《文艺研究》、日本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アジア时报》和 Journal of Cult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韩国的 Th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美国的 Cross - Current: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先后发表了好些意见不一的评论。2014年,由于辻康吾先生和陈冠中兄的介绍,《中国再考》和《何为中国》分别在日本和香港出版,这两本薄薄的小书居然也引起各方



面关注。先是2014年春夏,我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4月底,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特意组织了题为“Unpacking China”的闭门讨论会来讨论这个话题,会上邀请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参加,其中有加拿大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教授,有来自美国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朋友及哈佛的研究生,讨论得相当热烈。尤其是会议之前,许倬云先生传来他尚未完成的书稿给大家讨论,会议开始的当天又通过skype专门致辞,这可能就是后来他命我给他的《华夏论述》一书写“解说”的缘起。接着,在那一年的秋冬,日本《每日新闻》把2014年“アジア・太平洋”大奖授给了《中国再考》这本小书,在11月的颁奖仪式上,去年刚刚故去的亚细亚调查会会长栗山尚一先生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亚洲太平洋”奖设立二十几届来,第一次把唯一的大奖授给小小的“文库”本,这让我感到很荣幸。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何为中国》不仅获得第八届“香港书奖”,香港浸会大学还特意组织了一个有关“何为中国”的讨论会,陈冠中兄和罗贵祥教授邀请了来自韩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者,包括廖咸浩、白永瑞、金由美、许纪霖等一起讨论,会上学者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的《思想》第31辑(2016)上,这些意见让我颇为受益,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让我进一步思考。同一年,日本东方书店邀请了几位日本学者,合作翻译《宅兹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也在学界朋友的推荐下,决定邀请翻译出版这本《何为中国》,现在,这两本书的日译本和英译本已经分别完成,大概不久就可以出版。因此,我应当感谢这几年中,始终给我帮助、与我讨论、给我启迪的各位朋友,当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瑞典皇家学院会议的各位参与者,包括罗多弼、张隆溪、王赓武、王汎森、欧立德、程艾蓝和巴斯蒂夫人等教授,还有年届九旬的马悦然教授,他不仅主持了开幕式,还整整一天都在会议上听我们

讨论。

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小书呢?这是因为还有一些问题,过去的几本书没有说清楚,或者还有一些关键想法,在这几年又略有调整。我并不是说,写了这一本小书就可以“题无剩义”,毕其功于一役。其实,这本小书要说的话相当简单,也就是我在《结论》中要说的那几点,这里不必重复。倒是有一点,我想在这里向读者交代:因为我主张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在移动和变化,不能用现代国家的概念去理解古代帝国的历史,也不能用现代中国的领土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疆域,因此,所谓“周边”,不仅包括了现在中国境外的日韩越缅印俄等等“外国”,也包括了历史上原本在汉族中国边缘的“异族”。这使得我们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也要加以重新调整:我们不得不把原本归在“中外关系史”的内容,与归在“中国民族史”的内容,彼此打通界限之后重新审视,说明它们“成为中国”或“成为外国”的历史过程,也不得不把过去在华夏边缘的那些历史,不再看成是远离中心的“边疆史”,而是重新放在当时的位置,以“全球史”或“区域史”的眼光重新考虑其意义。

毫无疑问,这些回顾历史的课题有来自现实的问题意识,学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纷至沓来的风波总会引发他的思考。因此,这些年中曾三番五次被人追问,这些有关历史的研究能否解决现实问题,诸如领土争端、国际关系、民族矛盾或者国家认同等。在这里我要坦率地说,历史学者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在屡屡被追问的时候,我不得不反复回答同一句话,这就是“历史学家只是诊断病源的大夫,却不是能开药方动手术的医生”。这一点,在这里还需要再次声明。

像前一本《何为中国》一样,我要特别感谢余英时先生再次给这本小书题写书名。

2016年9月于芝加哥大学

# 巴黎访学记

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2017年2月7日至3月7日,我应邀担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客座教授,在巴黎逗留一个月。



这期间,我作了四次英文讲座。2月8日第一场讲座主题为“耶稣会文献中的明清鼎革”,由EHESS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陆康(Luca Gabbiani)教授主持。该讲座着重介绍了一批有关明清鼎革的耶稣会文献,探讨了这批文献对于研究中国明清鼎革史的价值。我认为,明清鼎革是17世纪发生在东亚的全球性重大历史

事件,有必要从全球史的角度加以探讨,而这批西文史料将使这一研究角度成为可能。

2月15日第二场讲座主题为“耶稣会士与南明”,由EHESS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蓝莉(Isabelle Déron)教授主持。该讲座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西文献,通过两组人来分析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与传教士的密切关系。一组人是耶稣会士,包括艾儒略、毕方济、卫匡国、何大化、聂伯多、曾德昭、卜弥格和瞿安德;另一组人是南明朝的奉教重臣,包括庞天寿、金声、郑芝龙、瞿式耜和焦璉。我在该讲座中通过在华耶稣会和澳门葡人对满清态度的转变,来分析卜弥格悲剧的原因。

2月23日第三场讲座主题为“耶稣会士与鞑靼”,由EHESS人类学研究中心Cléo Carastro教授主持。该讲座首先简要地纵向阐述了中文“鞑靼”和西文“Tartar”两个历史概念的内含,随后着重分析了耶稣会文献中“Tartaro”的具体所指。我认为,自1618年以后,随着东北边疆女真人的崛起,在华耶稣会士笔下的Tartaro大多数指的是女真人(满洲人),而Tartaro Oriental(东鞑靼)则专门指女真人(满洲人)。本讲座介



绍了耶稣会士对鞑靼政治、军事、服饰、饮食、风俗、宗教信仰、明清战争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以及耶稣会士对鞑靼人、鞑靼政权、明清鼎革的不同态度及其立场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在耶稣会士看来,明清鼎革无非是一朝取代另一朝,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改朝换代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或许可为时下盛行的有关“新清史”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2月27日第四场讲座原本的主题是“明清鼎革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以与前三场讲座相匹配,构成“耶稣会士与明清鼎革(1618—1662)”这一大题目的一部分。但邀请方希望我从宏观的角度谈谈中欧关系史,于是题目变为“近代早期中欧关系史”。本场讲座由EHESS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Antonella Romano教授主持。在报告中,我从贸易和传教两个方面梳理了16—18世纪的中欧关系,并尝试将这一看似双边的关系放在东亚、东南亚区域背景中,阐述欧洲不同海洋国家在东亚海域的角逐,以及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回应。

讲座的听众主要包括EHESS的师生,以及巴黎三

大、法兰西学院等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他们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中西戏曲文本比较、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法国汉学等题目,语言功底都很好。

在准备讲座的间隙,我走访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远东学院图书馆、新开放不久并专门馆藏艺术史图书的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以及巴黎戏曲图书馆—博物馆。此外,还在EHESS中国科技史专家詹嘉玲(Catherine Jami)教授的带领下,参观了巴黎药学院博物馆,第一次见到了龙涎香、阿尔葛尔默斯虫(胭脂虫)、金鸡纳树等标本,以及其他来自东方的草药标本。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与著名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家族后人 Bourgoing 先生见面。他来听我的讲座,并告知他家珍藏的傅圣泽家信。目前我正积极推动这批珍贵书信中译本的翻译、出版事宜。我两次前往巴黎旧货市场,淘到了十余张与中国和东亚有关的18世纪前期版画,这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印象和观念的重要图像资料。3月2—4日,我前往布列塔尼拜访雷恩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罗思德教授,交流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事宜。

## 新书介绍

- [英]李约瑟著,张卜天译:《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此书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撰的论文集,共收录他于1944至1966年发表的八篇论文,集中展现了他对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思考。“滴定”一词原是化学术语,指用一种已知溶液来测定

某种溶液中化合物的量,这里被李约瑟用来喻指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来测定各自的特性。书中李约瑟

的讨论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二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本书的八篇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在回应这两个问题。第一篇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是概述式的,简略分析了影响中国科学传统的各种要素。第二篇论文《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哪些方面领先于西方。但一个悖论是这些科技的传入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西方发生社会变革,中国社会自身却十分稳定。第三至第六篇论文都试图解答这个悖论,也即两个核心问题。李约瑟认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古代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朝建立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欧洲任何制度都不相同的特殊形式的制度,即“官僚封建制度”,又可称为“亚细亚官僚制度”。这种制度通过集权使得中国



古代科技保持很高的水平,但也因为阻止了商业的发展,导致科学未能进一步进步。第七篇论文的主题是时间观念,中国古代文明具有线性时间观与循环时间观两种观念的要素,并且线性时间观占主导,因此中国文明对待时间的态度与未能自发发展出现代科学并无关系。最后一篇论文讨论自然法观念,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帮助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八篇论文的写作年代不一,侧重点也不同,从中可以看到李约瑟对东西方科学与社会认识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吴洪斌 整理)

- 洪大容著 夫马进译:《干净笔谈》,日本:平凡社 东洋文库,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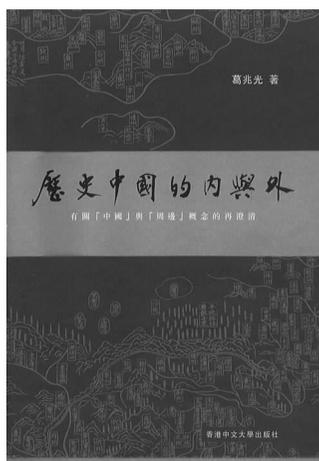
本书是朝鲜学者洪大容于1776年2月在北京访问的燕行录,其中记录着朝鲜人的燕京之旅,还有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洪大容的燕行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39年出版的《干净笔谈》(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干净

笔谈》),另一个则是本书(《干净笔谈》)。而实际上,洪大容从北京回朝鲜后首先完成的回忆录名为《干净笔谈会友录》,之后才新修订并改名为《干净笔谈》。在译者夫马进看来,《干净笔谈》可以说是诸多燕行录中最为详细且生动的一部。对于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中国明清之际出版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朝鲜燕行录中却能找到大量未见于中国史料的史实。在数量浩繁的燕行录中,《干净笔谈》关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在思考什么、又究竟如何生活。其记录之翔实,可说在外国史料中无有能出其左右者。从阅读

的方面来说,即便今人阅读此书,也应会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前近代东亚知识分子之国际交流境况感到兴趣盎然。

(郑钧洪 整理)

- 葛兆光著:《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该书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有关东亚与中国研究系列论著的最新力作,其中展现了什么是“周边”,亦即什么是“中国”的讨论。葛兆光教授从十年前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研究计划,把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保存

的有关中国史资料作为“新材料”,试图提供重新认识东亚和中国的多重视角与立场。为此,葛教授陆续出版了《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等著作,在国际学界受到广泛关注。而在此书中,葛兆光教授围绕边疆是一个移动的空间这一核心观念来讨论中国的“内”和“外”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阐述。因此可以说此书是葛兆光教授十余年推进“从周边看中国”研究的“收山之作”,也是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达。作者在这本书中梳理了历史上中国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动与交错,说明“内”与“外”之变化,并尝试沟通原本分属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包括“边疆民族”)、历史地理学(包括“边疆史地”)、全球史(和区域史)等各学术领域的数据和方法。作者指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在移动和变化,不能用现代国家的概念去理解古代帝国的历史,也不能用现代中国



的领土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疆域。因此,所谓“周边”,不仅包括了现在中国境外的日韩越缅印俄等等“外国”,也包括了历史上原本在汉族中国边缘的“异族”。相应地,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也要加以重新调整,对于各自为政的民族史与国别史,应该重在说明它

们“成为中国”或“成为外国”的历史过程,对看似远离中心的边疆史,以“全球史”或“区域史”的眼光重新考虑其意义。

(吴怡宁 整理)

## 外刊撷英

福谷彬,陈亮的事功思想及其孟子学解释(陳亮の「事功思想」とその孟子解釈),集刊东洋学(116期),2017年1月,第50—69页。

陈亮的思想常常被理解为是以功利大小为首要价值标准的所谓“事功主义”,但同时应当注意到,陈亮也重视动机的正当性问题。陈亮认为,只有为官者的心与万民一致,才能成就大功业。他虽然被称作“事功派”,但也认为动机具有与功业同等的重要性。

朱熹之重视动机,是为了排除功利性和出于私利的算计;与此相对,陈亮之重视动机,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心与万民之心相等——也就是动机的公共性。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义”,而追求一己之私利则是“利”。陈亮对为了公众利益而以“赏罚”操纵民众的做法表示肯定,又认为为追求公众利益而算计反而是值得鼓励的行为。这就是朱熹与陈亮理解“义利之辨”的不同之处,而两者对于“义”的理解还有着更为本质的区别。

陈亮在解释《孟子》文本时指出,“好货”、“好色”等欲望虽然于个体是恶,但如果万人都为了实现这些欲望而加以“扩充”,那么欲望也可以成为实现王道的契机、可以成为善。陈亮从是否与万人的心态具有共同性这一角度出发,来判断道德性的善与恶。然而对朱熹而言,“义”是作为绝对规范的本性,个体之恶绝不可能因为具有共同性而转化为善。

以是否具有共同性来判断善恶,这一点对讨论陈亮思想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陈亮与朱熹一样否定私

欲,但又不像朱熹那样要求灭绝私欲,而是认为万人共有的欲望即是正当的。他提出“道外无事”的主张,主张在形而下层面上求道,这一主张在字面上似乎与道学并非格格不入。但陈亮的主张乃在于将人们的感情、欲望等“事”变成众人共有之物,借此推行“道”的思想,从他声称没有“事”应当被压抑、否定来看,陈亮的思想与以“灭人欲”为基本方针的朱熹思想全然相异。在争取增加受益者数量这一点上,陈亮之重视动机与追求更大功业的目标相一致。大概也正是这种特征,令陈亮的思想被理解为重视结果的“事功主义”。

考察陈亮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的著作,可以见出其中既有贯彻始终的思想,也有经过与朱熹的论证后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陈亮的代表性主张如“道无本末内外”、“道之常存”、“心无常泯,法无常废”、“天下无道外事”,都是强调从形而下的事物中发现“道”,他认为理想不是对日常事物的压抑和否定,反倒是对其的扩大和发展,这是陈亮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主题。

另一方面,陈亮通过与朱熹的论争,认识到汉唐与三代的差距源于贯彻“工夫”与否的差异,并得出贯彻“工夫”就能达到三代的功业这一观点。朱熹所说的“工夫”即“灭人欲”,论争中陈亮承认“工夫”的必要性,而没有言及“工夫”的具体内容。实际上,陈亮指称的“工夫”与《孟子》密切相关。《孟子》中的“好货”、“好声”、“好色”,与陈亮思想中将理想视为日常性事物和情感的扩大和发展的倾向相吻合,《孟子》的思想促进了陈亮思想的深化。这是陈亮思想通过与朱



熹论争而获得发展的部分。

《朱子语类》批评《孟子》的阐释方法过于粗枝大叶,朱熹所作《孟子集注》甚至批评“好色”、“好货”之说为“曲学阿世之言”,但陈亮却以此为发展自身思想的一大根据。这种道学思想发展的多样性,也显示出《孟子》一书本身所具有的多面性。

**高山大毅,21 世纪的徂徕学(21 世紀の徂徕学),思想(1112 期),2016 年 12 月,第 8—14 页。**

本文主要介绍日本思想史学界徂徕研究的进展。现今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各领域学者研究的共同领域,来自伦理学、政治学、日本史、日本文学、中国哲学等各学科都进入了这一领域,这些学者的知识背景、研究方法也各自不同。事实上,日本思想史研究也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例如汉文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发现典故与先行讨论的能力等。

近世日本思想的研究史明显分为“近代化”论与“日本化”论两个方向。“近代化”论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代表,认为江户时期思想的发展最终导向近代性思维。该书描绘了“朱子学思维样式”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解体,具有“近代性意识”之萌芽的获生徂徕思想开始出现的图式。丸山以朱子学为江户时期的基本意识形态,但这一认识显然偏离了事实。其他学者如曾根原理、前田勉、若尾正希等分别提出“神国”思想、兵学、“阅读《太平记》”思想等作为对“体制意识形态”的理解,但德川幕府的政治体制是否依据体系化理论治理社会,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怀疑。平石直昭在丸山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注徂徕学的“认识主体”的形式,将徂徕学理解为规定自身认识的“语言和制度框架”的对象化,其中包含着为认识世界而人为制造出“框架”的主体形象。“日本化”论则将近世日本思想史视为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在日本被接受与变化的过程。此论点以尾藤正英为代表,他认为相比个人道德的提升徂徕的思想更注重社会整体的安宁。尾藤的“职务体系”论虽非主流,但他讨论了生活在身份社会中的江户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非常富有启发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尝试采取“近代化”论与“日本化”论相结合的立场,与此

同时,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研究者们(子安宣邦等人)批判这种视“近代”的价值或所谓“日本”的框架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子安的研究试图解释徂徕学在十八世纪的“思想空间”中具有“事件性”。如今无名的江户时期学者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研究进展明确揭示了徂徕学的“事件性”。

2000 年以后,研究的细分成为徂徕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学者们围绕媒介、身体性、语言、他者等问题做出了细致而深入的解读。不同于以往的是,从思想与具体制度和技法的关系出发展开的研究逐渐增多了。徂徕的言语论、教育制度主张、使用政治术语的概念等问题,都成为学者关注的论题。其中最为突出的研究潮流,当属“思维样式”论与“秩序构想”论两种图式。“思维样式”论与丸山真男的早期思想颇有渊源,试图从具体的政治论中抽象出思想家的思考模型和认识框架。“思维样式”论对研究对象的思想进行高度抽象,虽然舍弃了很多细节,但在同时研究多个领域的思想家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秩序构想”论的着眼点并非思想家的认识框架,而是尝试分析他们具体如何形成这种秩序观念。“思维样式”论认为政策、制度等都是表面现象,而“秩序构想”论则认为其中有值得反思的思想内涵。2000 年以后的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重心由“思维样式”论向“秩序构想”论转移,而今后徂徕学研究的进展,同样值得研究者们认真注意。

**钱德梁(Erica Brindley),文化认同与音乐在古代中国的典籍化(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music in early china),华裔学志,第 64 卷(2016)第 2 期,第 255—275 页。**

本文主要研究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79—221),文人如何通过音乐的组织 and 分类方式,去定义和强化他们独特的文化和种群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华夏、诸夏和周。战国时代文人关于音乐的划分和评价的文字,并不十分关注音乐本身的形式和理论,而是充满了道德批判,这一事实说明音乐在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认同成型、表达和推广的重要载体。通过具体说明儒家文人如何阐释各个音乐类型的区别,以及如何用这种音乐类型去贬低与正统周文化不符的音乐形式,本文



揭示了文人使音乐典籍化的过程,也是文人强化一个种群和文化的自我意识的过程。

首先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确认了战国儒家文献作为音乐典籍的性质。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在于它们不仅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还被不断重复、不断诉说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给下一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战国经典是礼崩乐坏情况下的一种固化,比如《荀子》里的《劝学篇》,而《劝学篇》尤其提到了音乐也是需要学习的技艺之一。东周时,从乐中分出了诗,如《左传》中关于吴国公子季扎在鲁国听乐的一段故事。

第二部分讨论《论语》中过度音乐的概念,作者通过分析《论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批评郑声的两段,发现了早晚期文献对于音乐态度的不同和加强。第三部分则着重分析《论语》对“淫乐”的批评,文章认为这反映了当时的作者对于负面变化的关注。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荀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凶恶型”音乐,发现它们对靡靡之音的文化焦虑和对周乐的保护态度,较之《论语》更进一步。并且认为,《性自命出》和《荀子》的作者对周乐的推崇、对其他“淫乐”的批评,是为了加强对周和华夏的自我认同及其优越性的肯定。

战国时代的音乐典籍化进程显示了一种激烈的文化变化:种族和文化要求优越,成为华夏定义自己及其文化形式不同于其他文化的运动的一部分。鉴于我们对战国时期精英与军队之间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的了解,似乎意味着对音乐典籍化的话语恰恰适应了这样一个新互动的社会。也许是第一次,周的文化精英发现自己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真理。这样的精英自然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而音乐正是在这种对自我的重新评估和重新肯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Matteo Nicolni-Zani, 《第一部中文版〈本笃圣人行实〉》(The First “life of Saint Benedict” in Chinese: an Exemplary Biography contained in Alfonso Vagnone’s *Shengren Xingshi* (1629)),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26, No. 2, 2016.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把天主教隐修圣人的传记介绍到中国,为的是鼓励和帮

助信仰者坚定信仰。天主教圣人传记类似于中国传承已久的高僧传、居士传、高士传和善书。1629年,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640)的中文本《圣人行实》出版,介绍的是天主教诸圣行迹,其中《本笃圣人行实》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圣本笃传记。此前,台湾学者李爽学认为高一志《圣人行实》主要依据的是雅各·德·佛拉金(Jacobus de Voragine, ca. 1228—1298)的《黄金传说》(*Legenda aurea*),而本文作者分析得出,高一志在把《本笃圣人行实》一篇译成中文时,依据的并非是《黄金传说》,而是在入华耶稣会士中间流传的《诸圣之花》(*Flos sanctorum*)。《诸圣之花》一书依据教皇格利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540—604)的《对话录》(*Dialogues*)第二册内容编成,著者是西班牙耶稣会士佩德罗·德·里瓦德内拉(Pedro de Ribadeneira, 1527—1611)。对比西语《诸圣之花》和汉语《本笃圣人行实》可以看出,中文译本篇幅短于西班牙原文。一是由于中文语言较为简练,二是高一志在翻译时忽略了一些文段,并精简了一些故事。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他在翻译时省掉西方人名、地名,忽略赞扬服从等美德的片段以及一些具体的行为仪式,删除了圣本笃去世后的故事。此外,高一志在翻译《本笃圣人行实》时也几次沉溺于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故事细节中,例如圣本笃通过身体禁欲克服不洁诱惑,圣本笃劝诫修士等。高一志有意将圣本笃塑造成一个隐圣的形象。隐修、隐居在中国传统悠久,而圣本笃符合中国传统中完美的隐士。最后,《本笃圣人行实》中三分之二的篇幅表明圣本笃是神迹的创造者。一方面,神迹是圣洁的最高表现,在十六世纪末欧洲广泛流行;另一方面,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对神迹的着迷和对邪恶的恐惧是一普遍特点。圣本笃的神迹中被恶魔诱惑、与恶魔斗争并胜利的故事,无疑会对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Nicolas Standaert, 《进呈康熙皇帝的荷兰、佛兰德和德国版画》(*Dutch, Flemish and German Engravings Presented to the Kangxi Emperor*),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2016.

明清时期,欧洲插图图书持续传入中国,这些插画



书从欧洲不同的地方经由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批介绍1708到1720年间进呈康熙皇帝的欧洲插画图品的中文手稿,这些插图书是向康熙介绍圣经故事的有效工具。不过,目前尚未找到与这些说明对应的图书实物。作者在文中考证了其中两部中文手稿里介绍的图书的来源:一部手稿介绍了一本圣经图画书,资料来源是荷兰版画师维斯切尔(Claes Jansz Visscher, c. 1587—1652)编辑的版画集《圣经剧院》(*Theatrum Biblicum*, 1639, 1643);另一部介绍了一本有关天使的图说书,来源于德国巴洛克版画家克劳斯(Johann Ulrich Kraus, 1655—1719)编制的《圣经里的天使和艺术》(*Biblisches Engel-u. Kunst Werk*, 1694)。

第一部中文手稿(BAV, Borgia Cinese 318(2))共有58对开页和一个拉丁文标题,对468幅图画进行了介绍。这些介绍内容与荷兰绘图师、版画师兼出版商维斯切尔的《圣经剧院》一致,仅有四处微小不同,单从目录上就可看出。《圣经剧院》复刻的是版画师兼出版商约德(Gerard de Jode, 1516/17—1591)的《新约和旧约宝库》(*Thesauru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1579, 1585),这是一部有关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图画书,共有61个系图,由多位绘图师和版画师合作完成。《圣经剧院》最早的一版完成于1639年,后又于1643年、1650年和1670年再版。流传最广的是1643年版,相较第一版,多加入了约150幅版画。《圣经剧院》何

时、由谁进呈康熙皇帝,并不确定。作者分析可能是由莫斯科使臣进呈,而宫廷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昇很有可能在某些时间向康熙介绍过圣经插画书。另外,这部介绍性的中文手稿是1708年进呈康熙的,作者推测,这部介绍性的中文手稿的作者有可能是徐日昇。

第二部中文手稿(BAV, Borgia Cinese 316(17))共有107对开页,中文标题为《神显现图象解略》,另附有意大利文标题。这是一部草稿,有修改痕迹。该著作介绍了三个系列的插图:天使、耶稣寓言、有关勇气的世俗插画。这部书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说教性的。其中一页备注:“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送内以备进呈”,可知,这是进呈康熙的,但不确定指的是手稿最后一部分的进呈时间还是整个手稿。经作者研究可知,这部手稿中介绍天使插图的部分源自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奥格斯堡有名的版画师兼艺术家克劳斯的《圣经里的天使和艺术》。这部书由30幅连续图画组成,每幅图的构成和布局类似,大部分插图也是复制,并非克劳斯原创。《神显现图象解略》没有作者,但文章作者根据进呈时间、手稿藏地和翻译《圣经里的天使和艺术》需要的语言,推断有可能是康熙宫廷的白晋、纪里安或戴进贤之一。文章作者未能找到其它两个图系的资料来源。

(陆颖瑶、陈玉芳、祝思靓 摘译)

# 第七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 夏季研修班招生启事

为促进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外学生交流与培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复旦大学合作开设第七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

## 一、招收对象

1. 欧美各大学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15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2. 上海市各高校人文学科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15人;
3. 日本、韩国各大学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5—10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 二、日程安排

时间:2017年6月23日至7月2日(共10天)  
上课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801室  
6月23日(周五)下午报到

6月24日(周六)—6月29日(周四)课程与考察  
6月30日(周五)自由活动、撰写课程论文  
7月1日(周六)上午:分组讨论  
下午:结业典礼  
7月2日(周日)上午退房、结束研修班

## 三、授课教师及课程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A Tale of Two Cities: “Old” and “New” Shanghai and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古柏(Pieter C. Keulemans)(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The Informal Information Economy of the Late Ming: Gossip and Rumor in Feng Menglong and Jin Ping Mei*

大木康(Oki Yasushi)(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晚明文人冯梦龙研究概述

中岛隆博(Nakajima Takahiro)(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地上的普遍性和亚洲的灵性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纳四裔入中



华?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

李星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唐代山水画诗与墓葬山水图像的互证

#### 四、费用

学生自己负责:往返上海的机票费及机场到复旦大学的交通费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

1. 日程中安排的参观考察费用
2. 海外学生在夏令营期间的住宿费
3. 所有学生在夏令营期间的餐费

#### 五、学分和证书

参加研修班的学生修满课时,本校研究生计入公共选修课或跨一级学科选修课学分;结业时,将向全体学员发放结业证书(具体办法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为准)。

#### 六、上海学生、日本韩国学生报名

报名表:将“申报表”填写后请导师签署意见(文

史研究院网站可下载申报表,<http://www.iahs.fudan.edu.cn>)

报名时间:2017 年 3 月 6 日—5 月 10 日

投寄方式:

1. 将报名表格投到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 楼信箱“暑期研修班”

2. 或者邮寄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办公室收 200433

3. 或者可以将签字的申请表扫描后发到 [wsyjy@fudan.edu.cn](mailto:wsyjy@fudan.edu.cn) 的邮箱。

联系电话:86-21-55665284

\* \* 欧美大学的学生报名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组织,可联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 [Elman@princeton.edu](mailto:Elman@princeton.edu) 或者柯马丁(Martin Kern) [mkern@princeton.edu](mailto:mkern@princeton.edu)。

#### 七、入选名单公布

公布时间:2017 年 5 月 20 日左右

公布渠道:文史研究院网站 <http://www.iahs.fudan.edu.cn>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7.01.01——2017.03.31

## • 2017年1月11—23日

葛兆光教授应香港城市大学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做“中国文化客座教授系列讲座”，讲座共分为“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东亚史的研究方法”两个专题共6场。分别为：“通天彻地：玉琮及其象征意义”、“马踏匈奴？从有关‘马’的艺术品看帝国的形成”、“想象死后世界：墓室壁画与东亚文化之连锁”、“联系与交错的东亚史：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学术与政治之间：明治到昭和年间日本有关东亚史之研究”、“揽镜自鉴：东亚史文献略说”。

## • 2017年1月27—28日

董少新研究员和邓菲副研究员参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全球史中的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作题为“明清鼎革：一个基于多民族史料的全球性事件”、“*Diffusion and Assimilation: Some Thoughts on Using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Global History*”的学术报告。

## • 2017年1月

刘震研究员与我院陈靖文博士合作的论文《略论波斯文本的〈弥勒授记经〉》发表于《西域研究》，2017年第一期。

## • 2017年2月7日——3月7日

董少新研究员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发表四次演讲，分别为“耶稣会文献中的明清鼎革”、“耶稣会士与南明”、“耶稣会士与鞑靼”、“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关系”。

## • 2017年2月9日

刘震研究员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作题为“*Argada and nirgargada*”的演讲。

## • 2017年3月14—17日

我院和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合作举办的第五届“东亚人文研究”博士



生论坛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邓菲副研究员和张佳副研究员带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系、中文系 13 位研究生前往参加论坛。

- 2017 年 3 月 18 日

刘震研究员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了美国东方学会主办的年会并提交题为 *A Brief View on two Manuscripts of Bodhisattvāvadānakalpalatā found in Tibet* 的会议论文。

- 2017 年 3 月 18—22 日

邓菲副研究员赴香港中文大学作文化管理项目访问学人,并作题为“门扉半开:论宋金时期丧葬艺术中的启门题材”的学术报告。

- 2017 年 3 月 23 日

葛兆光教授应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邀请,参加“何为中国”讨论会,发表题为“什么时代中国热衷讨论中国——从思想史角度看”的演讲。

- 2017 年 3 月 28—29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哈佛大学东亚系与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的“当代中国思想”工作坊,发表题为“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的报告。

- 2017 年 3 月

葛兆光教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余音——学术史随笔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溢副研究员的论文《临安与南宋的国家祭祀礼仪——着重于空间因素的探讨》,发表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1 分,2017 年 3 月。